

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研究的文献述评——从地区和阶层双维度的考察

潘叶萌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030；

摘要：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我国 1999 年教育扩招政策，更多人拥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后。本文主要在阶层差异和地区差异维度对相关文献梳理，归纳以往研究已达成的共识，发现高等教育机会主要受政策导向的影响，但是家庭社会阶层带来的优势也不能忽视。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公平；阶层差异；区域差异；综述

DOI：10.69979/3029-2735.25.11.090

引言

作为现代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教育系统不仅承担着资源分配功能，也构成了个体社会流动的核心通道。高等教育作为联结早期社会化与职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决定了成功。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教育系统实现了阶段性跃迁。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毛入学率在政策实施后的三年间（1998-2002）从 9.76% 跃升至 15%，标志高等教育体系完成从精英模式向大众化阶段转型；随后持续攀升至 2007 年的 23%、2012 年的 30%，至 2019 年达到 51.6%，正式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中，规模扩张与机会分配的均衡性之间的关联性，逐渐演变为教育公平研究领域的核心命题。本文主要就社会阶层维度、地区维度以及两者交叉影响的维度上，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旨在揭示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多维图景，提炼既有研究达成的理论共识，为后续研究建立分析基点

1 阶层差异

1970 年代末期的制度转型催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引发社会阶层结构的系统性重构。这一进程集中体现于教育系统的功能分化：作为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的核心机制，教育既承载着优势阶层的代际传承功能，亦构成弱势群体实现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通道。高等教育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加上高校扩招让更多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国许多社会学家都开始关注教育扩张后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是否会发生变化。

针对阶层间教育不公平问题的代表理论是 MMI 和 EMI。MMI 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又称“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平等”理论，由拉夫特里和豪特提出，认为教育扩张会让所有社会成员，无论出身如何，都成为教育机会的受益者。但是教育资源会优先满足优势阶层，当他们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弱势群体才可以获得剩余的教育机会，阶层差距因此缩小^[1]。EMI（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论也称“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同样认为教育扩张后教育资源会优先满足优势阶层，但他们会优先选择高质量教育，只向弱势群体敞开低质量教育资源，从而维持阶层差距^[2]。由于制度环境与社会历史不同，这两种理论不能直接适用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政策导致优势阶层在教育上并没有优势。改革后，尤其是改革深化时期，阶层间入学机会差距才逐渐增大^[3, 4]。基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现状，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更符合 EMI 的理论假设^[5]。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扩充，认为其中的原因更复杂^[6]。

2 地区差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在办学规模、资源分布及入学机会等维度呈现显著空间差异^[7]。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后，规模扩张引发教育机会分布格局的结构性调整，也引起了教育学者的关注^[8]。主要有以下两点发现：

第一，高校扩招后地区之间的高校入学机会（能否

上大学)的差异在整体上有所缩小。刘精明发现高校扩招后,1998年到2006年各省市录取率之间的差异是明显下降^[7]。杨江华对比我国2006年到2012年间31个省市(市/区)高考录取率后高考总体录取率后,也发现各省份间的差异逐渐缩小^[9]。即扩招政策有效抑制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差异的不断扩大;但在扩招后期,直辖市和东部等机会优势省区与西部地区入学机会似乎呈现分化反弹态势^[10]。

第二,在重点大学与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上(能否上好大学),各省份间的差距保持稳定,未明显缩小。王志根通过对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014年与2006年在各省的招生名额分配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分配不公平状况有轻微好转,但区域差距依旧明显^[11]。万国威等人通过研究2005年到2015年间各省份“211工程”高校入学机会的分化趋势,分析发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省际分化,且近十年间这种省际分化并未有明显的缓和趋势^[12]。刘宁宁等人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并未消解区域间优质教育机会的分配差异,反而在政策实施后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加剧趋势^[13]。杨江华通过2006到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纵向追踪研究,揭示重点大学和一流大学录取率在各省份之间的差距相对稳定。但将我国地区进一步划分为超发达地区(京津沪地区)、相对发达(中部地区)以相对落后地区(中西部地区)后发现相对发达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于另外两个地区呈现“中部坍塌”格局^[9]。有学者认为普通高校区域录取差异的缩小与优质高等教育机构招生格局的固化形成鲜明对比。其深层动因在于1999年扩招政策主要作用于地方性普通院校,而部属重点院校特别是“985工程”建设高校基本维持原有招生规模,部分院校甚至实施了生源紧缩政策^[9]。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分化根源于精英高校招生配额分配中显著的生源属地化特征^[14]。这种制度性壁垒直接催生了“高考移民”的治理困境,其持续存在恰恰反证了特定区域优质教育机会的集聚效应^[15]。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一方面确实是由于政策倾斜导致的,但是同时也会受到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张东海等人把这种作用机制称为“自然条件+政策干预”的综合性作用^[16]。

3 不同地区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异

中国高考招生制度实行的是分省定额制。在此制度框架下,地区公平问题和阶层差异问题从来都不是相互孤立的。单独探讨地区差异或者阶层问题容易造成问题简单化或者误判^[10, 13]。曹妍等基于EMI与MMI理论框架,结合2010年区域阶层人口结构与2015年招生计划数据,揭示了三个核心发现^[5]。第一,在京津沪地区,优势家庭学生的入学机会反而处于全国最低水平,而弱势群体却享有较高的入学机会。第二,对弱势阶层学生而言,京津沪广等地区弱势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呈现较高的水平,西藏、云南、贵州、江西等中西部省份则刚好相反,弱势学生的入学机会则明显更低。第三,京津沪地区内部阶层差异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内部阶层差异显著。其解释为:核心教育优势区(京沪津)由于人口流动等原因导致优势阶层占比较大,面对有限的教育资源时竞争程度较激烈,从而导致阶层内部入学率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的优势群体则受益于区域人口结构的稀疏化分布,其教育机会获取具有显著正弹性;

弱势群体的机会分配呈现显著的空间梯度差异,京津沪这类地区弱势阶层学生比例相对较小,加之投放了较多的名额,在优先满足优势阶层学生的前提下,依然剩余较多的机会给弱势阶层学生;而贵州、甘肃、西藏、青海、云南等中西部地区由于弱势阶层学生人口较多且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数偏低。因此,剩余给弱势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更少,与MMI理论关于教育扩张与阶层差异的互锁关系高度契合^[5]。

刘宁宁与吴克明聚焦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研究,其研究结论与既有成果具有一致性,但通过将非京津沪地区细分为相对优势与相对劣势区域,对已有研究形成重要补充:绝对优势地区内部阶层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水平,而相对优势与相对劣势地区内部则呈现显著阶层分化。纵向分析表明,高校扩招后,绝对优势与相对劣势地区的内部阶层差异未产生显著变化,但相对优势地区内部差异出现扩大趋势。该现象的形成机制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东、中、西部大区域政策调控模式,导致东部部分相对劣势地区的入学机会未获显著改善,反而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另一方面是增量招生计划沿用总量分配模式,虽使相对优势地区入学机会总量增加,

但增量资源主要被优势阶层获取,加剧了区域内部的教育不平等^[13]。

4 结论

总的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呈现显著的政策主导特征,教育机会的分配、变化都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有紧密的联系。不过,我国教育在近几次的改革中已经开始从关注大的区域层面转变为现精准补偿,在扩张教育规模、选拔精英人才和追求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随之而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文化资本代际传递与社会经济地位再生产机制持续作用于机会分配场域,优良的家庭环境和家学传统确实是培养卓越人才的重要基础,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优势。对教育不平等的空间与阶层维度的机制化研究,不仅能够解构中国社会流动的拓扑结构,更可为社会公平政策供给实证依据但是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存在实践悖论:过度均质化可能消解卓越创新动力,绝对自由化则易固化阶层壁垒。这种“公平-效率”的张力关系,实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持续校准的基准尺度。

参考文献

- [1]Raftery A E, Hout M.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 41-62.
- [2]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6): 1642-1690.
- [3]吴晓刚. 1990-2000 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J]. 社会. 2009, 29(05): 88-113.
- [4]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03): 4-21.
- [5]曹妍, 唐珊珊. 普职分流与阶层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各地区分阶层入学机会指标的再构建及

其实证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1, 19(04): 164-183.

- [6]唐俊超.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J]. 社会学研究. 2015, 30(03): 123-145.
- [7]刘精明. 扩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7(04): 142-155.
- [8]李春玲.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02): 65-89.
- [9]杨江华. 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及其变迁[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35(12): 27-34.
- [10]路晓峰, 邓峰, 郭建如. 高等教育扩招对入学机会均等化的影响[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6, 14(03): 131-143.
- [11]王志根. 教育部直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公平性研究[D]. 2016.
- [12]万国威, 靳慧琴. “地方保护主义”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省际分配不公的元凶吗——基于 2005 到 2015 年间 211 大学高招录取率的量化研究[J]. 教育学报. 2017, 13(02): 114-126.
- [13]刘宁宁, 吴克明. 高校扩招对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地区和阶层双维度的考察[J]. 现代大学教育. 2021, 37(06): 83-91.
- [14]郑毅. 高考招生平等的制度实现——以高招名额分配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为视角[J]. 教育与考试. 2009(06): 16-22.
- [15]刘传江, 朱劲松. 公平与效率视野下的高考移民观[J]. 人口研究. 2006(06): 55-62.
- [16]张东海, 李莉. 扩招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差异的再分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9, 17(01): 142-162.

作者简介: 潘叶萌(2001—)女, 汉族, 江苏句容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